

辛亥革命义士谢鸿泰事略

□张荣起

为酬壮志东渡扶桑

谢鸿泰，字一尘，1873年出生于栖霞县杏家庄村一个家境殷实、诗书传家的门第，自幼聪慧过人，诗书琴棋一触即通，厌恶繁文缛节的封建礼教。年长以后，对清朝政府腐败昏庸的政治嫉恶如仇，矢志以改变社会现状为己任。当时出国留学之风日盛，只要条件允许，有志青年无不心动。1904年，满怀报国之志的谢鸿泰偕妻马肃贞（也称马淑祯）一道东赴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夫妻双双出国留学，当时在栖霞县唯此一例，全山东也不多见。久居封闭落后国土的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妻，到了人才云集的异邦眼界大开。他们很快结识了我国留学日本的一批有志之士，如黄县人徐镜心、日照人丁惟汾等。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创建中国同盟会。谢鸿泰夫妇与徐镜心、丁惟汾等53人成为首批会员，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谢鸿泰还是山东主盟人之一。

马肃贞是栖霞县马家窑村进士马桂芳之女，可谓大家闺秀，幼年随父亲在台湾宜兰县知县任所居住数年，所受教育和视野不比丈夫逊色。当时，马肃贞对同期加入同盟会的浙江主盟人并兼任女子部、评议部宣传、评议工作的秋瑾非常敬重。一身侠肝义胆的秋瑾，很快成为谢鸿泰夫妇无话不说的战友。秋瑾创立“天足会”，宣传女权，提倡女学，谢鸿泰夫妇均给予积极支持。1905年11月，日本政府出台《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秋瑾极其气愤，当即与至友们呼吁中国留学生罢课，但没发挥多大作用，便毅然决定回国，并号召我国留日学生归国抗议。谢鸿泰夫妇深表赞同，并与之相约回国后“办学校以鼓吹革命”。

1905年底，谢鸿泰夫妇告别早稻田大学，乘船返回祖国。

南北呼应共谋大计

归国后，秋瑾与易本义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继而创办《中国女报》，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等，宣传妇女解放，鼓动革命。

与此同时，谢鸿泰夫妇并力联络留日同学徐镜心、邹秉绶等人在烟台创办东牟公学。学校所需经费悉由谢鸿泰夫妇筹措，所聘教员几乎全是革命党人。他们在学生中秘密传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思想。东牟公学对外是一所学校，对内则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南来北往的联络点，实际已成为胶东革命的中心。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谢鸿泰夫妇又着手创办“端本女校”。在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马肃贞毫不犹豫地将父亲遗留下来的田宅家产以及个人首饰、嫁妆变卖，以资学用。女校成功创办以后，夫妇俩各执一校，师生勤力，和衷共济，砥砺前



清末戊戌变法风起之后，中国大地涌现出很多不堪官府腐败的反清义士。一些先驱者为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争取民主，挺身而出，寻求强国之路。栖霞县的谢鸿泰就是其中之一。

行。谢鸿泰同时还在某报兼职，发挥舆论阵地作用，宣传废专制、立共和，与秋瑾南呼北应。

天有不测风云。1907年，秋瑾与徐锡麟策划浙江与安徽同时起义。由于情报泄露，徐锡麟被捕就义。秋瑾本可暂避险境，可她坚信“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而凛然面对，“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遗言后英勇就义。噩耗传来，谢鸿泰夫妇悲愤不已。马肃贞从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马秋仪”，以示仰慕楷模形象和继承秋瑾遗志、矢志继续奋斗的革命精神。

此时，谢鸿泰与革命党人在烟台开拓的革命阵地日益壮大，烟台革命志士云集。这不仅使烟台本埠革命活动发生明显变化，而且带动邻近各县革命活动风起云涌。此事引起当局的恐慌和敌视，他们明察暗探，将谢鸿泰等被列入缉拿乱党重点人物。一时间，港城烟台阴风四起，恐怖万状，革命中坚力量面临危机，谢鸿泰被迫逃往潍县（今潍坊市区）。他们夫妇虽脱离险境，但辛苦创办的东牟公学和端本女校都随之被迫解体。

舍家赴难促鲁独立

谢鸿泰夫妇到潍县后，通过朋友关系，分别谋得在广文书院和崇实女校执教的工作。此时，革命党人与清朝统治者之间已形成剑拔弩张之势，处于不同阶层的各种人物也粉墨登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谢鸿泰从种种社会乱象中，看清了革命之不易，前途之艰险。他后来在《怀虚诗草》中的诗句“磨砺心益坚，豪气自磅礴”“从此长鞭，不负平生约”，正是当时心境的写照。不久，谢鸿泰的革命宣传工作就借助在书院任职的机会重新开始了，广文书院也成为革命党人新的联络点。

1911年10月（农历辛亥年八月），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潍县，刚因宣传革命被广文书院奉命辞退的谢鸿泰备受鼓舞。他对妻子说：“清廷治覆矣，当促其终！”于是夫妻俩立马收拾细软，率女儿兰畹、兰馨赶赴济南，参加山东独立活动。

11月12日，50余名同盟会会员在济南大明湖历下亭秘密集会，议决成立保安会，并推举谢鸿泰为会长。13日，在济南各界商讨山东独立问题的聚会上，谢鸿泰慷慨陈词，对山东巡抚孙宝琦的推诿和狡辩进行有力抨击，令孙宝琦理屈词穷。接着，谢鸿泰严正声明：如不同意，就武力解决！最后，孙宝琦不得已接受了民军“都

督”头衔，当即宣布脱离清廷，并通电宣布山东独立。

数日后，武昌方面通电邀请独立各省派代表前往商讨建立民国中央政府事项，谢鸿泰以山东代表的身份动身南下。他先去武昌，后转至上海，于12月29日出席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会议。三天后，他又在南京出席了孙中山先生的就职典礼。南方各省革命的大好形势鼓舞人心，谢鸿泰兴奋不已。他以“河山今还我，建国资贤劳”“直抵黄龙日，会饮醉醇醪”，抒发此时的情怀。

壮志未酬转事慈善

谢鸿泰离开山东赴武昌商讨建立全国共和政府之际，清廷遗臣孙宝琦重蹈旧辙，乘机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并对革命党人大肆搜捕，恐怖阴云再度笼罩省城济南。马秋仪积极联络革命志士，共同誓言继续革命，不遗余力，同时教导两个女儿一起投入革命宣传工作。

此时的烟台，因有留日回国的同盟会会员徐镜心、宋钟尧、李凤梧等先进分子并力活动，以及两校（东牟公学和端本女校）一报（《渤海日报》）前期的孕育影响，紧步武昌起义后尘，举戈易帜，成果斐然。然而，事过不久，烟台革命权力旁落，形势日趋紧张。宋钟尧等人赴上海请求援助，并邀请谢鸿泰回烟台主持大局。谢鸿泰推辞说：“我不愿为都督名义与同志相摩擦。若为革命成功，未若请胡瑛任山东总督。彼接近黄克强（黄兴），可有利于请派海军助战也。”此建议得到孙中山先生赞同，于是以胡瑛为首的山东军政府在烟台正式成立。谢鸿泰与徐镜心同时担任都督府高级顾问。烟台军政府初创，财力薄弱，运转艰难。马秋仪出面发动女子国民运动，筹集资金。在她的动员下，胞弟马宝麟变卖庄宅一处和土地、山岚数百亩，支援新军之用。

民国建立两个多月后，孙中山先生以“清帝退位”为条件，让总统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借机宣布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又于1914年5月公布《中华民国约法》，使原来谢鸿泰等人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成为废纸。其间，同盟会会员掀起的“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热心于议会斗争的谢鸿泰只好离开南京，避祸于济南。是年末，他见到老朋友于洪起，曾发出“处世皆梦幻，夙生何仆仆”的消极感叹。

1915年12月，袁世凯倒行逆施，众叛

亲离，天下人群起而攻之。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6月，袁世凯病逝。7月，国会重新召集，谢鸿泰还短暂停息。但是，此后军阀混战给全国造成的动荡不定局势，使他无力兑现“我欲乘六龙，飞向昆仑巅”的豪言壮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谢鸿泰虽然保留山东省议会议员的头衔，照例履行应尽的职责，但已无法左右局势。1922年，国民党山东省第三届议会选举，谢鸿泰以元老资格被提名为议长候选人。为了竞选获胜，他支持“天坛”派（当时山东省议会分四个派系）议员为自己拉选票。结果，由于被一些违背正常选举秩序的举动所干扰，谢鸿泰落选了，其威望也随之下降。想不到的是，随后靠贿选登上大总统职位的曹锟，竟以“贿选罪”通缉谢鸿泰。

1925年，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国民党内部分裂，全国形势更加复杂和险恶，谢鸿泰无奈发出“坎坷悲枯，怆怀忧家国”的喟叹。他心灰意冷，只好携家眷退避故里，以吟诗、抚琴打发时日。1926年至1928年，赋闲在家的谢鸿泰目睹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搞反革命政变，各地阴风暗流、甚嚣尘上；地方国民党重组，新老派之间明争暗斗，非常痛心。新派年轻头领不但不尊重谢鸿泰等元老，还处处进行刁难和打击。面对如此环境，谢鸿泰不得不移居烟台，住在二马路东12号。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与妻子马秋仪主要从事慈善事业。夫妇俩先后成为烟台红十字会的主要成员，谢任会长，马任董事兼艺界女中董事。谢鸿泰还忙于筹办孤儿院、养老院等慈善机构，闲暇时弹琵琶、古琴和写诗、练书法。

谢鸿泰虽报国无用武之地，但初衷未改，气节未变。烟台毓璜顶上小蓬莱有他挥毫写下的“海天一色”，以抒胸怀；个人诗作，经过精挑细选，选40首编成《怀虚诗草》，付梓寄意。1934年，他曾通过亲属关系，营救过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官尚行出狱。1937年“七七事变”后，烟台沦陷。谢鸿泰因年事已高，家口又大，无法外迁躲难，只能原地隐居。日本人得知他的社会威望和留日背景，曾三番五次登门，许以厚禄，请他出来做事。当时谢家经济来源已断绝，一家九口生活拮据。面对软硬兼施的说客，谢鸿泰死不答应，并装出一副老态龙钟、病弱不堪的样子，隐身敛迹。

从此以后，谢鸿泰夫妇不问政事，率一家大小在房屋周围种菜养鸡，没钱花了就变卖家什、衣物，就这样艰难地度过了八年。抗战胜利后，谢鸿泰夫妇随女儿先后定居上海、苏州。

1954年，谢鸿泰病逝于苏州，享年81岁。谢鸿泰去世后，女儿将他使用的琵琶捐赠给了上海音乐学院。1960年，90岁的马秋仪亦在苏州病逝。章太炎先生曾撰文称赞她：“夫人初适先生时，资装甚备，后设学校及谋倡议，皆斥卖田宅以奉之。光复事成，其夫妇亦耦俱无等差矣。”

有一次我试探着问母亲：妈，我经常让你包饺子，你就不嫌费事麻烦？

一向强悍的母亲，少有的温和，幽幽地说：儿子想吃饺子，不费事的，打个电话，一会就包出来了。

这样幸福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15年，父亲去世了。在老家的三哥商量我，母亲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了。以后回来，喊上母亲，一同去三哥家吃饭。

三哥家离母亲的老屋很近，在一条大街上，隔几个胡同。三嫂调好饺子馅，和好面，端上炕，不再征求母亲面的硬软、馅的咸淡了。

母亲赶忙洗了手，刚要擀皮，侄女让母亲去吃橘子。母亲又要往笼子上拾饺子，妻子劝母亲去看电视。

母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眼神忽地黯淡下来，坐到沙发上，喃喃着：老喽，老喽，不中用了……

然后把头深深地埋在两手之间，一言不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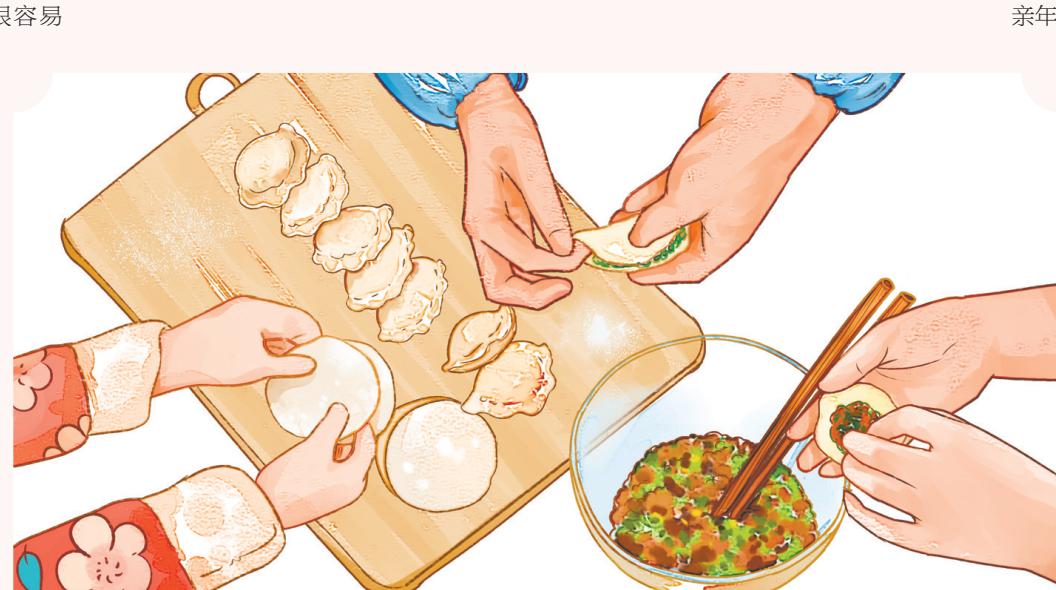
吃罢饺子，我喊母亲一起回老屋午睡，母亲的眼神，刹那间有了光亮，迅速下炕穿鞋，然后拉着我的手，往老屋走。

一路上，母亲的话也多了起来，对我嘘寒问暖。也不再拘谨，尽情释放母爱的天性。

到了老屋，我脱了皮鞋，褪了西装，躺在炕上，像是小时候躺在母亲的怀抱，踏实温暖。母亲赶忙打开衣柜，取了床干净的被子，亲切地唤着我的乳名，给我盖上。然后坐在我的身边，轻轻的拍打着，嘴里竟然哼起了小时候的歌谣。

年过半百，还能躺在老家的土炕上，像小时候那样，母亲给我轻拍被子，哼一曲催眠的歌谣。眼泪禁不住顺着脸颊无声流淌。怕母亲看到，赶忙扯被角遮住了脸。

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睡梦中，我仿佛又看到那盏挂在门框上的煤油灯，蒸气里母亲忙碌的身影，还有满桌的虾皮饺子。



美好的愿望包进饺子里。

夜幕降临，窗外的鞭炮声不绝于耳，礼花绽放，把小山村的夜空装点得五彩缤纷。三间农家小屋，十多口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饺子，看春节晚会，其乐融融，欢快的笑声在空气中震颤。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持续了四五年之后，远方的哥哥可能考虑父母年事已高，也可能嫌弃农家小屋的拥挤，抑或是忙于自己的事业，总之过年很少回来了。母亲一边剁着过年的饺子馅，一边嘟囔着：“不回来拉倒，清闲！”一边背过脸去，眼睛里有晶莹的东西在闪。

只是父亲很少去大街上凑热闹了，也不去看打锣鼓了。坐在老屋的门前，晒着

太阳，打着瞌睡，不时地瞟一眼那条通往村外的小路。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经常去市里开会办事。办完事我很少留在城里吃饭，顺道回老家，先给母亲打个电话，告诉母亲我要回家吃饭。母亲在电话里的声音抑制不住兴奋：“想吃肉蛋饺子还是三鲜的？”

推开开门，透过窗户，母亲不是在炕上包饺子，就是在灶间下饺子，父亲坐在灶间烧火。

两碗饺子下肚，母亲又把一碗饺子推到我的面前，幽默地来一句：使劲吃，又不用拿饭票……

大大小小饭店的饺子吃过不少，但总吃不出母亲包的饺子的味道。

铭钧叔叔走了，他是2022年12月28日被新冠病毒夺去了生命，享年81岁。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

我父亲有兄弟姊妹6人，三男三女，父亲是老大，铭钧叔叔是父亲的大弟弟，生于家乡蓬莱。从解放初期开始，爷爷奶奶和叔叔姑姑们都生活在青岛市区，唯独我的父亲从部队转业后先后在新汶矿区和龙口矿区工作。这样照顾爷爷奶奶日常生活的事情就辛苦了生活在青岛的叔叔姑姑们。

受祖上家教家训的影响，叔叔从小就是心地善良、善于帮助别人。在我5岁前，爸爸妈妈多次领我去青岛看望爷爷奶奶，也曾见过大叔叔，但是那时太小，记忆模糊。但是1969年7月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我对叔叔有了较深的印象。原因是母亲因产后医疗事故不幸去世。得到噩耗后，铭钧叔叔第二天就从青岛赶到新汶，帮助处理妈妈的后事。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起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我总忘不了叔叔和父亲的同事、邻居以及后来赶来的小姑奶奶一通忙前忙后的场景。爷爷在“文革”时期被批斗游街，每次回到家里心情不好，经常对儿子发脾气，叔叔都是小心翼翼地忍受着，多干活。他知道，做儿女的只有这样，才能为父亲分担一些压力。后来爷爷奶奶和小叔叔及两个姑姑被遣返到家乡蓬莱农村，只有铭钧叔叔和大姑姑留在青岛工作。叔叔曾痛苦地回忆道：那时真是人生最痛苦的一段岁月，每天下班后都想念外地的亲人们，挂念自己的父母，经常在山上遥望家乡，从心里为家人祝福。后来，政策放松，叔叔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跑前跑后，为爷爷落实政策而奔波，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的努力和组织上的关怀，终于使爷爷落实政策的问题得以解决，几年后举家返回青岛。

一家人回到青岛，又面临新的问题。遣返前，一家人住在济阳路的二室一厨的房子里，约50平方米，虽不宽敞也能住得开。遣返期间房屋被政府重新分配。而一家人回到青岛时，却无法安排住所。没有办法，叔叔将单位分配给他的二室的房屋空出来，让一家人居住。而这一举动，也导致他恋爱多年的女朋友因无住房无法结婚而提出分手。每当回想起这些，爷爷奶奶和姑姑们都觉得心里不好受。

在青岛的几十年里，无论小叔叔还是姑姑们家里有事，铭钧叔叔都是主动赶去帮忙。记得我的小叔叔铭国是父亲于1972年将他从蓬莱招工到新汶矿务局的。1984年小叔叔和婶婶从新汶矿务局调到青岛市，都是大叔叔帮忙奔波办理的，兄弟姊妹都夸他：铭钧心里总是想着家人，想着别人，为大家庭作出了贡献。对待家人是这样，对待工友和邻居也是如此，日积月累，在大家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曾告诉我，在他的记忆中，大姑姑青雯和铭钧叔叔学习最好，此话一点也不夸张，他俩都是初中毕业考入五年一贯制大专的。大姑姑考入的是青岛化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化学研究所。铭钧叔叔1959年考取山东地质学院，这是源于叔叔志向远大，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献身找矿事业，为祖国的资源勘探和开发作贡献。他1960年入学，不巧的是，由于国家经济困难等原因，1961年山东地质学院解散，叔叔被转到中专学校的山东地质学校。好像命运在给他开玩笑，一年后，地质学校又一次解散。这样叔叔又回到了青岛，三年的学生成绩一无成，无功而返。叔叔的内心别说有多难受了。人总是要有所追求的，为了掌握一门生存技术，于是，叔叔报名到青岛市商业学校学习，学习摄影专业。1965年毕业后，叔叔被分配到青岛市天真照相馆，成了一名摄影师。

有句话讲，人不顺时喝凉水都塞牙。1965年的一天，单位领导找他谈话，告知，因青岛印染厂新进一台20万元的德国产轨道式大型制版照相机，因缺乏摄影人才，上级要求从天真照相馆抽调部分骨干前去支援工作。服从领导是叔叔的一贯风格，他和同事一道愉快地来到印染厂工作。到了新单位开始接触该相机，好景不长，不久就赶上“文革”，使用洋设备受到批判，从此不再进口制版用相关材料，这样照相工作根本无法开展。再加上在有些人看来，印制花布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样叔叔和他的摄影伙伴都用无功而返。叔叔的内心别说有多难受了。人总是要有所追求的，为了掌握一门生存技术，于是，叔叔报名到青岛市商业学校学习，学习摄影专业。1965年毕业后，叔叔被分配到青岛市天真照相馆，成了一名摄影师。

有句话讲，人不顺时喝凉水都塞牙。1965年的一天，单位领导找他谈话，告知，因青岛印染厂新进一台20万元的德国产轨道式大型制版照相机，因缺乏摄影人才，上级要求从天真照相馆抽调部分骨干前去支援工作。服从领导是叔叔的一贯风格，他和同事一道愉快地来到印染厂工作。到了新单位开始接触该相机，好景不长，不久就赶上“文革”，使用洋设备受到批判，从此不再进口制版用相关材料，这样照相工作根本无法开展。再加上在有些人看来，印制花布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样叔叔和他的摄影伙伴都用无功而返。叔叔的内心别说有多难受了。人总是要有所追求的，为了掌握一门生存技术，于是，叔叔报名到青岛市商业学校学习，学习摄影专业。1965年毕业后，叔叔被分配到青岛市天真照相馆，成了一名摄影师。

现实生活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们都喜欢流连于五彩缤纷的鲜花绿叶之间，或穿行于奇拔俊秀的高山之中，或漫步在茫茫大海边，感受大自然的美景美色。其实，在生活中还有一种美，更值得人们去发现和珍惜，那就是一个人美的心灵、美的言行和美的品德，这种美是人性的美，是有感染力的，有思想性和传承性的，也是最令人终生难忘的。

铭钧叔叔虽然去世了，但是他身上的美德，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征稿启事

为进一步凝聚城市特色，挖掘文化内涵，打造城市名片，提升城市竞争力，“仙境海岸·鲜美烟台”将成为我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的城市形象宣传用语。围绕这一主题，本报开设“烟台故事”专栏，欢迎广大读者提供您所知道的相关文化故事，要求稿件内容真实、准确、严谨，可读性强、故事性强，且有据可循。

投稿邮箱：lifeng@ytaily.com

□于泉城